

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

唐

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

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

朱刚 著



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

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

東方出版社

唐

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

朱剛

著

東方出版社



◎ 学术

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

责任编辑:孙 涵

装帧设计:刘林林

版式设计:任宗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朱刚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10

(日晷文库/吴先宁主编)

ISBN 7-5060-0889-0

I. 唐…

Ⅱ. 朱…

Ⅲ. 唐宋四大家-文艺思想-文学研究

Ⅳ. I206.2

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

TANG SONG SIDAJIA DE DAOLUN YU WENXUE

朱 刚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25

字数:193千字 印数:1—8,000册

ISBN 7-5060-0889-0/B·135 定价:15.30元

总 序

东方出版社与吴先宁同志共同合作，经周密考虑与多方联系，约集近数年来获得博士学位的古典文学研究者，组织出版一套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著作，第一批共十二种，起名为《日晷文库》。我觉得这一丛书的名称很有特色，它不但是比喻中华古典文学还如日行天，灿烂辉煌，照耀我们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祖国大地，而且象征我们这一代年轻的研究群体视野开阔，思想敏锐，全身心地投入这一蓬勃向上的精神领域，努力开创一个更加光彩夺目的学术天地。

80年代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确实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转型时期。这是本世纪前80年所未曾有过的。所谓转型，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对古代文学由单纯的价值判断而转向文学事实的清理，也就是由主观框架的设施而向客观历史的回归。这是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界在观念上的一大跃进。前几年在学术界曾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可惜口号虽然提出，讨论并未具体展开。但我们的研究实践却明确回答了这一问题。那就是文学史的研究，应当注意史的发展线索，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单位，不是简单排列的一个个作家，而是连续不断向前推进的不同时段。这就不是作家评论的程序汇编，而是文学群体的有机活动系列，包括作家之间的关系（如新老作家的交替，文人集团的友谊与冲突），作家群体的形成与消散，文学思潮的兴起与衰落，创作风格的变化，不同文体的代兴。这之中，

DJ69/32

群体与时段的研究,是这些年来最出色的成绩。有谁在这方面下了工夫,他的著作就能使人耳目一新。因为即使历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也不是孤立的人,在他的周围,有一个流动着的文学环境,有一个层次不等的群体,即使是大师级的人物,他也是属于同时同地的艺术家族的。

这种趋向,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特别是在年轻研究者中,已经形成一种冲力,那就是要从过去占很大优势的局部、个体研究中挣脱出来,对文学的长时期发展阶段作出整体的把握,在这种把握中表明研究者的力度与深度,反映这一代学人所特有的对文学命运的关切与忧思。

转型期的另一表现,就是重视“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古代文学研究要向深度发掘,当然要着力于文学内部发展规律的探求,但这种探求是不能孤立进行的。这些年来,文学与哲学思想、政治制度,以及与宗教、教育、艺术、民俗等关系,已被人们逐渐重视。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正如19世纪法国文艺评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说的,“个人的特色是由于社会生活决定的,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以民族活跃的精力为比例的”。当然,我们这样做,不仅要考虑文学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亲缘关系,更要探索文学在总的“历史—文化”环境中怎样显示其特色。它不是使文学隐没,而应是使文学作为主体更加突出。

这就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如果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真正有所进展的话,那么,这种文化意识的观念及其

在实际研究工作中的运用,是最可值得称道的成就。如果我们要从理论上对古典文学研究的经验进行一些探讨,那么这个文化意识问题就是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新的课题。

我觉得,从以上两方面的研究新格局和新思路来看这套丛书,可以说现在这十二种著作正是从总体上体现这一时代的学术风貌与年轻一代的创新气度。这十二种书,从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开始,一直至明清时期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都是从思潮、流派、群体出发,有意识地对文学史的线索进行清理,重在清理事实,而不简单地品评高下,不单纯立足于点的深化,而在于线的连续;与此同时,又善于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中把握恰当的中介环节,使我们接触到那一时代、社会所特有的色彩和音响。

自80年代中期起,在古典文学研究界有为数不少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培养出来和成长起来,这已构成我们今天古典文学界的一代研究者,他们无论从治学道路、理论观念,以及精神气质、学术兴趣等方面,都表现出与80年代以前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些不同已日益显露出一种新的发展方向 and 学术品格。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对传统研究的同时,应特别注意对现状的研究,而现状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这十余年来这一研究生群体的研究,研究他们和他们的著作,与研究古典作品本身有同样的意义,同样的价值。特别是这90年代以来的一批博士研究生,他们之中不少人更注意广泛吸收当代社会科学的新鲜知识,形成更为独到的研究视野和观念,而另一方面又努力对作为研究对象之一的文学史料作沉潜的研索,这种勤奋的实证训练是足以支撑他们作大幅度的理论探索的。当然,在这之中,需要对现实社会中的市场冲激与贫富差距有理性认识,要有左思《咏史》诗中所说的“连玺耀前庭,比之犹浮云”的心理准备。我想,这十二种著作产生的本身,就足以表明我们这一代年轻学人为学术而奉献的文化素质。

这套丛书的总序应由丛书主编吴先宁同志来写的，我推辞再三，但吴先宁同志与东方出版社还是希望我借此谈谈对古典文学研究现状与前景的看法。吴先宁同志是曹道衡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编委中傅刚同志的博士导师也是曹道衡先生，而曹先生则是我的学术至交。编委中的钱志熙同志，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我都分别在杭大和北大参预评议。过常宝同志关于楚辞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是我应聂石樵先生之邀到北师大去主持答辩的。黄仕忠同志虽在中山大学，但与我早有文字交往。我很感谢他，我在1962年所考的关于《琵琶记》作者高则诚卒于明朝立国之前一说（《文史》第一辑《高明的卒年》），得到他的赞同并给予进一步的补充论证。因此可以说，我有缘与这几位年轻博士生有学术交情，因此也就不自量力，为这套将能受到读书界注意和欢迎的《日晷文库》撰写此篇小序，谨请作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傅璇琮

1997年3月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道学的兴起	(6)
一 “中兴”思潮:道学兴起的时代背景	(6)
二 超越“礼”的“道”:“道”概念的来源	(11)
第二章 从啖助到柳宗元的“尧舜之道”	(15)
一 啖助的《春秋》学	(16)
二 “尧舜之道”的社会历史意义	(23)
三 柳宗元的道论	(30)
第三章 韩愈《原道》的研究	(36)
一 道统论	(36)
二 “定名——虚位”论	(54)
第四章 欧阳修的文化功绩及其“至理”学说	(66)
一 “斯文有承,学者有师”	(69)
二 “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	(87)
第五章 苏学:自由与审美的道	(108)
一 “苏学”的历史地位	(108)

二	“苏氏之道”的三个层面	(113)
三	“苏氏之道”的审美内涵	(146)
第六章	“道”与各体文学	(165)
一	“文以载道”	(169)
二	“以文为诗”	(203)
三	“以诗为词”	(228)
主要参考书目		(251)

引 言

韩、柳、欧、苏，古称文章四大家，在所谓“唐宋八大家”中尤见精博。考四家之并称，来历甚早，苏轼刚刚去世时，米芾作《苏东坡晚诗五首》，^①其三有句曰：“道如韩子频离世，文比欧公复并年。”这里还缺一个“柳”。至南宋初年，苏文盛行，四家之称便随之而出，王十朋《读苏文》三条：“唐宋文章，未可优劣。唐之韩柳，宋之欧苏，使四子并驾而争驰，未知孰后而孰先，必有能辨之者。”“不学文则已，学文而不韩柳欧苏是观，诵读虽博，著述虽多，未有不陋者也。”“韩欧之文，粹然一出于正，柳与苏好奇而失之驳。至论其文之工、才之美，是宜韩公欲推逊子厚，欧阳子欲避路，放子瞻出一头地也。”《杂说》：“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于韩，法奇于柳，法纯粹于欧阳，法汗漫于东坡。余文可以博观，而无事乎取法也。”皆以韩、柳、欧、苏四家为唐宋文章之代表，一再标榜。《读苏文》三条，依作者自署的年月，作于“绍兴庚午七月”，即公元1150年，距苏轼去世（1101年）刚好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中，或已有过四家并称的文字，笔者还未能检出。故目前为止，我暂把“四家”之称的发明权归于王十朋。稍后，有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二：“学文须熟看韩

^① 见米芾《宝晋英光集》卷四，丛书集成本。本书引述古人的单篇诗、词、文，凡出自作者的通行别集，或出自极易寻检的总集如《全唐文》者，为避烦琐，以下不一一出注。

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至南宋的后期，四家并称似已较为常见，如罗大经《鹤林玉露》天集卷五，及李涂《文章精义》中都曾提到。到了元代，唐宋四家的说法便作为对前朝文学史的总结而确定下来，郝经《答友人论文法书》：“唐之文则称韩柳，宋之文则称欧苏。”^①此后的材料就引不胜引了。这是对“四家”并称的历史回顾。从王十朋的文字可见，其标榜“四家”，目的在于肯定苏轼的历史地位，因此，米芾的那两句诗，虽然少个“柳”，却已经具备了这个意思。

之所以要提到米芾这两句诗，是因为它非常明确地把“文”与“道”联合起来，揭示出时人把苏轼看作韩愈、欧阳修之继承人的原因，从而也揭示出：在何种意义上，“四家”得以并称。“道如韩子”、“文比欧公”，可视为“互文相足”。韩愈以一篇《原道》，奠定了他作为儒学复古运动与古文运动之双重领袖的身份；柳宗元是与他并称的同志；欧阳修在生前即以韩愈的继述人自居，且被世人所承认，他并且以“我所谓文，必与道俱”来训励苏轼；苏轼受训，当即“又拜稽首”，表示“有死无易”（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可见，文章四大家间亦以“道”相联结。文学史上的古文运动，与哲学史上的儒学复古运动，实是一个运动的两个方面，而以韩柳欧苏四家为代表，围绕着一个“文以载道”的历史命题。

但四家的成就还不止于此。文学史上所谓“以文为诗”，作为与“宋诗”之形成密切相关的创作风气，大致亦以韩愈为始，欧阳修为继，苏轼为高峰；至于词，欧阳修是宋初小令的代表作家之一，苏轼则以“以诗为词”开倡豪放派。因此，在这四家的身上，从“道”出发，通过“文以载道”、“以文为诗”、“以诗为词”，将时代的思潮与个体

^① 中华书局1994年版《苏轼资料汇编》辑录了大量的评论资料，但元代部分缺郝经《陵川集》与王构《修辞鉴衡》中的文字，宋代部分亦缺李涂《文章精义》，上文引述的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虽已收入，但所引的那一条也被漏辑，这些都可使增补。

文学紧密地联系起来,构成了以同一节奏律动的文化景观。

本书旨在阐述“道”与各体文学间的深刻的联系,认为,没有“道”的宏扬,便不会有上述那些文学运动,“道”对于那段历史时期中各体文学(尤其是正统诗文)的影响,其积极促动的方面要远远胜过消极制约的方面。虽然我们不否认文学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但并不认为它可以脱离其余的文化门类而独自发展,更不认为那些代表了时代的最高成就的作品,会隔离在当代的思想潮流之外。因此,作为一个历史的命题,“文以载道”并不能轻易否定。只要我们从某一家文学概论出发,而是从文学史的实际情形出发来看问题,我们便不会在赞赏四家之“文”的同时闭目不见支撑着其“文”的“道”。如果说四家之间,后者比前者有所发展、进步的话,我也并不同意那是因为后者比前者更“正确”地处理了“文”“道”关系。这种观点意味着:古文运动的发展史,是把“道”一步步赶出文学的历史。这不是我所知道的古文运动。我眼里的四大家,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文化巨人,他们不是空头文学家,而是一身兼为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的巨匠,在哲学、文艺、政治上都作出了非凡的贡献;而他们在这几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决不会互相否定或异辙。这也就是说,他们在文学史上体现出来的某种“发展”,也将体现在哲学史、政治思想史上。因此我想证明他们在对“道”的内涵的阐释的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是他们在文学上取得进展的最直接的原因,也就是说,两个进展具有一致性,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文化发展的整体风貌。当然,这一致性本身还有更深的原因,植根于社会历史的背景之中。

由此目的出发,本书前五章从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上阐述了四大家对“道”的内涵的不同体认,最后一章从“文以载道”、“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三个环节,论证“道”的理性内核如何展示在各体文学创作之中。哲学思想是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文化中最精华

的部分,我把韩愈之后以“道”作为最高范畴的哲学学说统称为“道学”,它包含了我要论述的四家学说,及宋代其他各家的学说。至于“理学”,我把它作为“道学”其中的一个流派来称呼,即专指程朱一系,与陆氏的“心学”对立,也和宋代别的诸家“道学”相区分。因为现代学者对这几个词的用法尚有不少分歧,我也不敢自是,所以,暂且看成为了行文方便而作的约定,说明如上。

至于“文以载道”一词,学术界已考定它为周敦颐所首倡,韩愈讲的是“因文见道”,柳宗元讲的是“明道”,欧阳修讲的是“文与道俱”,苏轼讲“有道有艺”,大致和“文与道俱”的意见相同。论者以为,在“载”、“明”、“见”、“俱”等字上,反映出“文”与“道”发生关系的不同方式。或许是这样。但我只想论述“道学”的进展对于文学的影响,暂不涉及“文”“道”关系的不同方式对于文学的影响,所以,这里选了比较常用的“文以载道”,来表示“文”与“道”之间的联系,暂不探讨“载”、“见”、“明”等字的歧异与优劣。

更要说明的是,本文剖析诸家的“道”论,是从哲学的最高本体应为真善美之高度统一这样的一般观念出发,来检视各家的“道”概念如何体现真善美的统一。在检视中,我发现韩愈的“道”概念是以“善”为核心的,欧阳修则比较注意推本于“真”,而苏轼的“道”论中多有阐明“美”的。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进步,因此,本文上篇即以此思路来论述四大家在“道论”上的发展。由于要强调“发展”的一面,我在行文中就着重于引述欧阳修关于“真”的探索和苏轼的“美”学思想方面的资料。实际上,总体上说,诸家之间,后者对前者基本上是继承发挥而不是排斥立异,也就是说,前者对于“道”所阐明的思想,仍包含在后者的“道”论中,欧阳修在把“道”推本于“真”时,并不抛弃韩愈的“善”,苏轼在发掘“道”的“美”学涵义时,也不曾抛弃“善”与“真”。所以,“道学”的发展,是“道”的内涵越来越丰富,而不是一步步被偷换。但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则必须着重论述

各家学说中所突现出来的比前人更新的成果,因此,善——真——美,成为我构想的三个环节。在这三个环节中,实际上并不是后者取代前者,而是增益、包含并统一,不断地走向三者高度统一理想境界。

第一章 道学的兴起

这里的“道学”，指的是中唐以来以“道”为最高范畴的儒家学说。这种学说的酝酿和提出过程，也就是中唐的儒学复古运动，其代表人物当然是韩愈和柳宗元。但若探讨其兴起的社会时代之背景，那么还要追述到一些先驱人物，涉及另一些与他们同时代的人物。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已有相当深入的探讨，本文不拟作全面的复述，只简单谈一下“道”的概念如何在当时被标举出来，然后探讨这个概念的来源，包括远源和近源，远源指先秦诸家学说对“道”的论述，近源则指唐代士人对“道”概念的一般认识，本文主要谈近源。

一 “中兴”思潮：道学兴起的时代背景

对于中、晚唐人来说，对开、天盛世的怀念和对安史之乱的反思，是思索的普遍的出发点。由此出发，有的人因为感觉着盛世不能再来而变得消极、失望，甚至堕落，他们的诗文中也就现出末世的景象：晦涩、奇异和唯美的倾向。但也另有一些值得敬仰的人物，在那个不断衰败的时代里，并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而发出“中兴”的呼喊。诗圣杜甫在《忆昔二首》中追忆了“开元全盛日”后，提出了“周宣中兴望我皇”的期望，他的朋友元结写作了《大唐中兴颂》，高仲武编的一个诗歌选本，取名叫《中兴间气集》。这一些，是以唐肃宗、代宗期间的恢复气象为“中兴”（其中杜甫的期望要更高些）。后

来唐德宗时，陆贽也每以“中兴”为言，而宪宗对藩镇作战打了几个胜仗，便被称为“中兴英主”。实际上，那都不能算真正的“中兴”，只是朝野上下在很长时期内弥漫着“中兴”的呼声，却是事实。

当然，除了呼声以外，还要提出办法来。办法一时被提出很多，除一般的应急措施外，还有比较完整的方案。根据前代的经验，具备“学说”之倾向的，大致可以归结为道、儒、法三家。因此，刘轲在元和十五年《上韦右丞书》^①中说：

今天下白屋之士，有角立秀出者，或能以黄老言，或能以儒术言，或能以刑法言，思愿吐一奇、设一策，使司化源者开目而见四方之事。

这已经是“中兴英主”唐宪宗驾崩以后的事了，所以刘轲列举这三家，对于“中兴”思潮兴起以来的各种言论，有些做总结的意思。当然，古代的经世之术，说来说去，总是这样三家。刘轲这段话，我们应当如此理解：中唐士人去干谒当道，提供“中兴”办法的有很多，而提出的办法也颇为纷纭。

但在这纷纭之中，至少就舆论上来看，儒学总是主导的。以复兴儒学来谋求“中兴”，是“中兴”思潮中的主流，这便是儒学复古运动，也就是道学的兴起。

如果仔细地分析一下，“道”在当时被提出来，是直接地出于对

^① 见《刘希仁文集》。此集中干谒之书还有《上崔相公书》、《再上崔相公书》等，内有“嗣圣重光，相公登庸”，“犬戎新逐，三晋四战之地无枭雄狼子”等语。考唐代史事，当在元和十五年，宪宗崩，穆宗继位，八月崔植为相（即所谓“崔相公”），十月藩镇王承宗卒，此年又有吐蕃入寇，复退去。与两《书》中语一一相合。参刘轲生平，其《上韦右丞书》当亦是同时所作干谒之书，《旧唐书·韦绶传》：“穆宗即位，以师友之恩，召为尚书右丞。”则在元和十五年。本传又载，韦绶在当时颇有入相的声势，这与刘轲书中的语意（“某公必为宰相”等等）相符。本传载韦绶于次年（长庆元年）三月转礼部尚书，则《上韦右丞书》当作于元和十五年或次年初。

安史之乱的反省。这是十分自然的：通过反省，明白了什么是导致灾难的原因，那才能知道用什么去谋求“中兴”。问题的答案被列举出很多：或归罪于杨贵妃惑君，或指责宰相无能、权臣奸佞，或说是过于重用胡人，而“羯胡事主终无赖”（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一），或又说是府兵制被破坏的缘故，……直至“封建”与“郡县”之争的老话题也被翻了出来，把“封建”制未得推行当作祸根。不过，最深刻的反思，却是对政治体制中官僚选拔制度即科举制的攻击，它一方面深中唐代社会阶层升降的现实，一方面又联系到“风俗”的问题，从而也就引出了“道”来。

唐代社会的统治阶级，陈寅恪先生曾正确地划分为三个阶层：一是北周以来的关陇贵族集团，一是北齐以来的山东士族，一是庶族出身的进士“新贵”。自从武则天有意擢拔庶族出身而由科举入仕的进士来削弱关陇贵族集团以后，唐代的上层社会，就基本成为山东“旧族”与进士“新贵”的对立。^①“新贵”的出现，源头就在科举。安史之乱才结束，杨綰便上疏要求停罢进士、明经二科，贾至、李栖筠、严武等人积极响应。他们认为，进士“新贵”败坏了社会的“风俗”，是罪魁祸首。《旧唐书·杨綰传》抄录了他的疏文，说这些进士们很糟糕：

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
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
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祖习既深，
奔竞为务，矜能者曾无愧色，勇进者但欲凌人，以毁谤为
常谈，以向背为己任，投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己，
喧腾于当代……

① 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